

## 第三篇 兩個人

### 鄧力群與農村發展組

發展組的創立和當時的很多活動，對其影響特別大的有兩位老人，第一個人就是鄧力群，他對農村發展組特別是創立初期和中期所起的作用非常關鍵，如果當時沒有鄧力群在各個方面有力的支持，可以說發展組是很難創立和開展研究工作的。

鄧力群對發展組的實際支持，還得從他和陳一諮的關係說起，鄧力群和陳一諮是通過鄧英淘認識的。鄧力群是湖南人，在 30 年代是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學生，當時就參加了共產黨組織的活動，30 年代中期入黨，在「一二九學生運動」中是參與人之一。之後到了延安，曾先後在東北、新疆工作過。建國之後他還做過劉少奇的秘書，「文化革命」前是《紅旗》雜誌的副總編。在文革中作為走資派被打倒了，陳一諮結識鄧力群是在 70 年代初期。1973 年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一直到 1975 年，這段時間周總理病重，都是鄧小平在主持日常工作。這一段做



鄧力群

了很多對「文革」錯誤的糾正工作，如提出對國民經濟的整頓，當時整個國民經濟的狀況已經非常危險了。這一時期，鄧力群就參與了鄧小平對文革的糾偏工作。

從當時的狀況來講，鄧小平不能直接否定文化革命，他只能從經濟工作、科技工作、組織管理的角度糾正文化革命的錯誤。鄧力群在這一段時期應該是起了作用的，關於科技工作、教育工作、抓整頓，他做了大量工作。在文化革命後期，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鄧小平和鄧力群都被再次打倒，鄧力群骨頭很硬，把很多事情都攬到自己身上，相反那個時候胡喬木就揭發鄧小平的問題，而且給「四人幫」寫了效忠信之類的東西，對此，粉碎四人幫後，胡喬木做了檢討。鄧力群當時是堅定的站在鄧小平一邊的，而且有理論素養，有實際工作經驗，也是對中國的情況有比較深入的瞭解的一個人。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他很快就成為中央高層的主要參謀之一，深得鄧小平、陳雲等人器重，參與了當時的高層決策。

據鄧力群自己回憶，1977年鄧小平再次出來工作時分管科技教育。當時準備恢復高考，在確定哪一年恢復高考的一次會議上，當時教育部等都認為目前還不具備條件，而鄧力群卻認為很多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都在自學，而且也有實踐經驗，他把這個意見說出來以後，鄧小平就同意了，於是在1977年開始恢復高考。對儘早恢復高考起了很大作用。

陳一諮跟鄧力群交往是在70年代，當時他已解除了隔離審查。這個期間陳一諮和他有較多的接觸。1979年，當時陳一諮想調回北京工作，給鄧力群寫了信，鄧力群和胡耀邦通了氣，而後經鄧力群批准，就把他調回社科院。當時鄧力群是社科院的副院長、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陳一諮回北京以後，在1980年4~7月到安徽做了幾個月調查之後，給鄧力群作了一次彙報，那次彙報持續了五個小時。1979年秋季，安徽一個叫郭崇毅的省參事室參事，寫了關於安徽肥西大面積的包產到戶的材料，當時認為包產到戶如在落後地區、山區等實行，至少不用去制止，可以寬容一點。肥西是安徽農業發展比較先進的地

區，也搞了大面積的包產到戶，並且效果非常好，郭崇毅的報告認為，農業發展先進的地區，也可以搞包產到戶。到北京以後誰也不敢幫他轉送這個調查報告，最後是陳一諮辦了這件事。因為當時包產到戶總體來講還是一個禁區，陳一諮等把這個材料轉給鄧力群，鄧力群把這個材料轉給鄧小平和陳雲。陳雲的態度是不要急，可以再看一看，不要馬上把它打回去。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之後，陳雲是中央副主席，是中央常委。鄧小平當時也是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當時的中央主席還是華國鋒。中央正式明確認為和支持包產到戶是1982年初，在此之前大約有三年時間，正式的說法是禁止普遍搞包產到戶。而正是這段時期，包產到戶從星星之火，進而席捲全國。這與在中央高層，有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趙紫陽、萬里這批人是分不開的，而鄧力群為此上串下聯，主動而積極，就是說，在農村改革的起步階段，或關鍵階段，他的歷史作用是必須肯定的。

陳一諮當時提出，對整個農村、農村的政策、農村的經濟發展，缺乏系統的研究，需要組織一批人來研究，當時沒有現成的隊伍。社科院雖有農業經濟研究所，主要還是以農業為主，研究局限在原來的體制範疇之內，並沒有把農村、農業、農民作為一個整體、一個相互關聯的系統來進行研究。他一再的提出中國農村是一個鉅大的複雜系統，包括環境、經濟、社會等多方面極其豐富的內容，每一個方面又包含不同的層次和諸多因素，這樣就要求不同的學科從不同的角度對農村開展多方面研究。多年以來，我們對農村的 research 相當薄弱，存在很多空白。很多極為重要的學科，比如農村社會學、農村教育學多年中斷，很多極為重要的課題，諸如農村就業、農村發展等很少有人重視，已經有的學科研究也遠遠不足。更重要的是學科間研究工作缺乏經常的協同與配合，各幹各的，單學科的研究不能構成有機的理論系統，從而不能為決策提供真正可行的建議和對策。在現代條件下，隨著人類改善自身能力的加強，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各系統、各因素之間的聯繫日趨複雜，人

的主觀能動作用日益增強，變化速度日益加快，沒有多學科結合對農村問題的綜合研究，是非常不利的。

從這樣一些角度，陳一諮多次向鄧力群陳述並提出能不能組織一批人，第一是自願投入精力來搞這個研究；第二就是專業與業餘相結合，並且以業餘為主，以這樣的形式來開始組織隊伍。涉及到經費，陳一諮提出能不能使用全國社科的重點項目資助經費。在這些方面得到了鄧力群的認同和支持，他也認為農村有大量的問題需要研究，採用這樣一種形式組織一些自願的人來研究當時的許多重大問題是非常必要的。當時用國家的經費來支持一個業餘的研究組織，這是一個很大的創新。能做到這一點，主要因為鄧力群當時是社科院的副院長。他認為這個事情是可以做的，他覺得經費用來支持最需要、最緊迫的課題，至於使用的形式他覺得不是最重要的，只要這個經費是用來支持國家急需的研究。具體的規定和程序，都是技術性問題，都是可以變通處理的。關鍵是有人能決策，敢於承擔責任。鄧力群處在能決策的位置，恰好他又敢於承擔責任。

鄧力群對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支持，是實實在在的。1980年10月以中國社科院農經所作為甲方，同當時《農業若干問題》這樣一個課題組為乙方簽訂了一個合同，正式承認了這種形式的合法性，並且國家在經費上給予了支持。那個時候確定的組長是王耕今，兩個副組長一個是陳一諮，一個是楊勛。由兩個副組長代表不同的法律主體來簽這麼一個合同，這在當時是一個破例的行為。這種形式最終能夠實現，離開了鄧力群的支持是完全不可能的。通過這一符合法律規範的形式，就使這一研究、這一組織、這一課題成為可能。

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立的會議上，他作為當時一個高級別的領導，到這麼一個小的研究組織上作了長篇的講話，<sup>①</sup> 可見他的支持力度。他一上來就說：「在座的同志中相

<sup>①</sup> 見《農村·經濟·社會》第一卷，知識出版社，第1~7頁。

當多的都插過隊，現在進了城，還能想到農村，這是很令人高興的事情。中國十人口中有八億農民，這是我們的基本國情，這好像是一個嘗試，但是從這種嘗試去看問題、想問題的人不是很多，你們就是這不是很多人中間的一部分，我們的事業非常需要大批這樣的人」。

他說：「我對農村有所瞭解，也有感情，聽到大家願意做農村工作，就感到和自己心心相印」。「希望你們能夠堅持下去，而且我相信你們是能夠做到的，不瞭解農村就不瞭解中國，農村的事沒有辦好，中國的事就不能說是辦好的」。回顧歷史，他說道：中國革命採取的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是靠農民的支持，使得中國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麼一個階段。他說：「一個中國人，如果眼裡沒有八億農民，就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認識缺陷，許多年輕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他們瞧不起農民。在你們眼裡，心裡是有八億農民的，儘管你們現在是小人物，但是你們願意把自己的真正能力全部貢獻給八億農民，那就代表了中國前進的方向，那麼這樣的精神生活是高尚的。」

當時有很多人在講兩代人之間的鴻溝，鄧力群認為：兩代人肯定在認識上是有差距的，但更大的鴻溝應該是觀念上的差距。他還很側重的講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農村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問題，第二個是農村的大面積的包產到戶的問題，基本上從正面予以肯定。他也強調一點，就是包產到戶是在集體土地所有制這樣一個條件下實行的。

在講話中還談到要深入細緻的調查，要實事求是。至於包產到戶，這是爭論多年的問題，最早是困難時期安徽提出來的，有些同志堅決反對。陳雲同志表示，何必那麼急急忙忙的反對，讓他試驗幾年再看好不好。現在來看，陳雲同志這個意見是正確的。1962年，鄧子恢同志派人調查，凡是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都比沒有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收成多。自留地最好，包產到戶的地次之，不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最差。中國農村生產資料中，土地佔有最重要的地位，保持了土地公有制，

在這個基礎上搞包產到戶，就找到了適合生產力性質的方式，受到農民歡迎又能促進農業生產資料鞏固和完善的經營管理形式。他還專門講到，耀邦同志最近講：我們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正確的，從土地私有制到公有制是一個很深刻很偉大的變革，否定八億農民具有歷史意義的革命形式，說得客氣點是無知，說的挖苦點是完全看不到八億農民的行動、思想、覺悟。他當時之所以強調這些，是因為當時包產到戶是一個禁區，要想讓包產到戶成為不是權宜之計，就是說不僅在落後地區、居住分散地區、革命老區這些地方可以搞，而能逐步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形式，變成一個全面性的政策，是要講過渡和策略的。鄧力群的這次講話，是在許多高層人士不敢明確表態的時候講的，看得出他對包產到戶是很支持的。

1980年為了包產到戶的事情，當時召開省委書記會議，在這個會議上，黑龍江的書記楊易辰等人堅決反對包產到戶，當時貴州的書記池必卿就說，我那個地方只能搞包產到戶，他提出：「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可見爭議非常大。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產到戶在全國很多地方都出現了，不只是安徽。小崗村當時出現的情況，貴州也有，實際上，包產到戶在中國，從來沒有絕過種，在文革中也有，從來都有的。只不過從60年代被壓下去後，80年代前是悄悄地搞，80年代是半公開和公開地搞。人們習慣於回顧歷史時總要找一個起點，這個起點實際是多形態的。但中國人喜歡搞標籤，總要在某一個地方插一個標籤。

在發展組的成立會上，鄧力群是從正面肯定包產到戶的，對大家組織起來搞調查、搞研究是全力支持的。他指出，「包產到戶、聯產承包、大包乾」等，各地農村有很多創造，「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些人借此攻擊三中全會的路線，以及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政策，特別是抓住包產到戶大做文章。他也講到宣傳工作有缺點，就是沒有講清楚包產到戶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經營管理方面的創造，從正面是需要作大量工作的。

鄧力群提出要把農村發展問題當成科學來研究，他當時

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話，大體意思是講：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在一開始註定要成為空想的，它的那些設計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容易陷入純粹的空想。改造社會的東西不能從頭腦中發明出來，應該是通過頭腦從現成的事物中把它發現出來。尊重事實，尊重群眾的創造，不能閉門造車。他在講話中說到：「經過三中全會以來兩年多的工作，過去在『左』的束縛下被壓抑著的正確的東西，得到了解放，過去做錯了的事情，現在總結了經驗，也知道了怎麼去做。『文化革命』期間，天天講『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都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林彪『四人幫』壓抑真正的新生事物。這兩年，真正的新事物顯現出巨大的生命力，到處湧現出來。不同的經濟條件，不同的氣候條件，不同的土壤條件，不同的地區要，不同的耕作習慣，不同的行業，都有各種各樣的創造。所以我們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充分地去發現廣大農民、廣大農村幹部在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指引下創造出的大批新鮮事物，從中總結經驗。書是要看的，腦子是要想的，要有思維活動，要有抽象推理，這都沒有問題；但基本點一定要建立在發現事物之間的客觀聯繫，發現有生命力的新鮮事物上。」

他強調，不要以為農民落後就沒有創造，不要以為農民窮就安於窮，如果說只有我們這些人才有創造，而八億農民沒有創造，那同空想社會主義就有點差不多了。所以要堅定的相信富有生命力的東西必定來自農民，農村富有生命力的東西必然來自八億農民。

他支持大家組織起來，就是覺得我們的社會需要大批這樣的人，通過長期堅持搞農村研究，勤勤懇懇地把八億農民創造的東西記錄下來，加以整理，加以提高。發現事物的客觀聯繫是不容易的。但是只發現還不等於已經成為科學了。發現了，要成為科學，還要通過思維活動，通過抽象分析，才能上昇為規律。希望這批人確有創造，確有發明，確有概括，確有提高。成為全心全意為八億農民服務的農村經濟學家。這是鄧力群支持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基本出發點。



在這之後，鄧力群又多次會見發展組的成員，多的時候有20~30人，少的時候是十幾個人，他常常在家裡聽發展組的彙報，他對發展組是非常關心的，包括對課題經費的落實，他甚至親自去督促。後來有人就提出來說，鄧力群之所以支持發展組，是因為他的兒子鄧英淘、他的女婿杜鷹在發展組，這個講法是有失偏頗的。鄧英淘參加發展組的時候，他還是北大經濟系的學生，他是利用業餘時間來參加，他以後的走向本來是可以有多種選擇的，不一定非得在發展組長期工作。發展組不是一個長期工作的最好的地方，恐怕在當時也是少量的人能做出的選擇，更多的人可能會選擇離開。杜鷹當時也還沒有跟鄧力群的女兒羅小韻結婚，他支持發展組的期間，杜鷹根本不是他的女婿。但是確實因為有鄧英淘跟陳一諮的這種聯繫，陳一諮和這群人在創立發展組的過程，跟鄧力群的溝通有了便利，也得到他的支持。他的支持更多的是對年輕人的培養，讓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變革有實實在在的作用。另一個方面，他確實覺得決策層需要有很多人去做社會調查、去做實際調查，然後提供一些意見給中央決策做參考。他覺得光靠中央研究室進行調研和發表意見在這種大變革時代，是肯定不夠的。如果有更多人願意去做這種最基本的農村調查、研究，他作為老一代的共產黨人，是應該滿腔熱忱去支持的。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眼光和胸懷。

至於與鄧英淘的父子關係、或陳一諮與他早就認識，都是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這樣一種形式提供了便利。發展組的產生在當時來講，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講偶然性，即正好由陳一諮、何維凌、王小強、鄧英淘這批人來創立，以及它的發生、發展的具體過程和具體形式，確實有偶然性。但就那個時代而言，如果不以這樣一種形式出現，也會以另外一種形式來產生。時代需要研究農村發展問題。而偶然性中又有一種必然性，陳一諮要組織發展組，他跟鄧力群有這麼一種關係。如果鄧力群當時反對農村的改革，他就不會這樣支持，這批人也可能就只能去研究另外一些問題。鄧力群對農村出現的新現



象，他是有想法的，他對人民群眾創造出來的各種新的形式是肯定的。對這些新的形式進行研究，就有如他多次在講話中一再告誡發展組的年輕人不要閉門造車，不要「語不驚人死不休」，單純去追求在言語方面的震撼，要做那種腳踏實地研究。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正式成立以後即著手各種研究，包括到滁縣進行調查。他認真聽取了農村發展組關於這次調查的策劃，參與了意見，給予了肯定。調查回來以後的綜合報告，最早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個內部刊物上登出來了，很快又在鄧力群任主任的中央研究室的內刊裡面把最重要的部分登出來了，不光是用正常的渠道送到中央領導人的手裡，有些可能是他親自去送的，包括最主要的領導人。很快地滁縣的調查報告得到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中央高層領導人的正面肯定。當然，這個報告也送到鄧小平、陳雲手裡。

其中最值得提出來的就是這個報告，他找了趙紫陽，趙紫陽對這個報告做了比較長的批示。而且當時明明白白地跟鄧力群說，這個報告把全國農村的情況講清楚了，看來在全國的都只能這麼辦，也必須這麼辦。這就是說中央高層比較明確的要把包產到戶、包乾到戶通過高層決策作為一種普遍形式在全國推開。後來滁縣調查的一些內容和觀點在中央的第一個一號文件中得到反映。在發展組的調查研究成果轉化為決策的過程中，鄧力群明顯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2年初，中央書記處開會時，議論了發展組這種形式，做了決定，認為需要有一大批人來做這種調查，包括經濟調查、社會調查。當時提出要組織幾百人。中央書記處一做出這個決定之後，鄧力群會見中國農村發展組的部分成員，社科院農經所的領導也參加了會見，鄧力群傳達了中央書記處的有關決定，他說中國農村發展組自1980年10月成立以來，做了不少工作，尤其對農村包產到戶問題的調查研究，為中央領導同志指導農村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意見，受到了好評，中央書記處經過研究決定進一步加強對農村的調查研究工作，計劃用幾

年時間把熱心於農村發展研究的隊伍擴大到兩三百人，通過一定的培訓和培養，從各個側面互相配合，對我國農村問題進行綜合性研究。此外，還將根據條件，逐步在各省、自治區建立相應的隊伍，形成全國性的調查研究網。人員主要從曾經在農村插過隊，然後又考上大學的青年中選撥，要以自願獻身農村現代化發展作為選撥的首要條件。

後來逐步明確先搞一百個編制，放在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工作由中央研究室和國家農委來指導。1982年秋中共十二大以後，成立了以鄧力群為主任的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和以杜潤生為主任的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則明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工作由這兩個研究室來指導。這在當時是很奇特的現象。

有了編制以後，大學畢業生到發展組工作才有可能。從這以後，發展組所倡導的研究工作業餘和專業相結合，以業餘為主，開始轉變為以專業為主。這是比較大的一個轉變，相當一批人就可以投入他的全部精力來做農村發展和農村改革方面的專門研究。記得當時中央書記處做了這個決定以後，在落實一些具體問題上，陳一諮讓我跟隨他一起到鄧力群家去彙報，當時就說到編制問題，雖然中央做了決定，但是從決定變成實際行為還有一個過程。鄧力群跟當時的國家計委主任宋平的關係非常好，宋平從甘肅省調到國家計委。鄧力群就當著我們的面跟宋平通電話說：宋平同志，發展組的編制，雖然說中央書記處做了決定，你那裡還得發個文啊！並在電話裡商量先給50個編制。當時國家機構的編制都要由國家計委統一安排，因為編制是和經費、財政支出聯繫在一起的。很快就由國家計委確定了這50個編制。發展組有了50人的編制，放在社科院農經所，成立一個相當於研究室的建制，明確由陳一諮任組長。

鄧力群在這次會見發展組成員之後，1983年初又很正式地在中南海會見了一次發展組的成員，主要是關心發展組的工作情況。當時發展組的很多人提出了入黨的要求，支部書記陳

錫文專門彙報了這方面的情况。鄧力群回應道：加入中國共產黨，只有一個標準，就是黨章規定的標準，符合條件，就可以入黨，不符合條件，就不能入黨。發展組的成員要求入黨，沒有任何特殊性，只能按黨章要求，符合一個就入一個。這次會見以後，農經所黨委很重視這個問題，把發展組成員要求正式入黨的事情列入了黨委工作的日程。不久，張木生、鄧英淘、王小強、羅小朋、白若冰、謝揚、以及我，都相繼入黨。

1983年以後，隨著鄧力群自己的工作重心轉移，十二大以後，他進了中央書記處並擔任中央宣傳部的部長，工作重心更多的轉到意識形態層面，在這之後他跟發展組的聯繫正式地委託吳象負責，並由吳象指導發展組的工作。他自己直接出面則越來越少。

還有一點是應該講的，鄧力群跟發展組這些年輕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當發展組這些人有具體觀點時，他可以講自己的意見，但從未強求發展組的成員一定要按照某種觀點來搞研究工作，而是強調獨立的思考和實事求是的判斷。他有時候會提出光看落後地區不行，也應該到經濟發達地區去看看；光看這種發展形態不行，也應該看看其它的發展形態，但他從來也不強求發展組的成員只能有這種觀點，而不能有另一種觀點。很少提出某種有傾向性的要求，這是在觀點上。

同時，在研究方法上他講了很多意見，比如要深入實際、要做大量的調查研究，在這方面他反而會提出明確的要求。但是你研究出來的成果，他該登就登，該講就講，有些東西可能和他自己的意見不一致，他也沒有強求一定要和自己的意見一致。這些都貫穿在整個過程中，是實實在在的。

還有幾件小事，其實也不是小事。在「六·四」以後，他知道國務院農研中心農村發展研究所參加了「三所一會」簽名，這當中相當多的一批人的觀點和他不一致，是有傾向性的，但是在決定發展所前途的時候，他的考慮，既有長者的風度，又有政治家的胸懷。「六·四」以後，很快就以杜潤生為主任的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撤掉，把國務院農

村發展研究中心撤掉。發展所也面臨被完全解體的危險，長期堅持研究農村的這批人有可能要散掉。在這種情況下，鄧力群出面找了李先念、王震等領導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發展所一分為二，如陳錫文、謝揚和後進發展所的 20 多個人分到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成立農村部，保留了這一批人。另外一批人就分到農業部的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基本上保持了發展所的基本研究力量。像陳錫文，他能夠長期的從事農村研究，與鄧力群出面保存這一部分人有直接關係。這樣通過他做的協調工作，為長期從事農村研究工作、農村改革工作的這批人保存了基本力量。他做這些事情時並沒有過多地考慮政治傾向、政治觀點，他只覺得這些搞研究的人應該保持下來。這都是最基本的事實，對於這些事實我們有必要記錄下來。從中可以看出人的豐富性、複雜性，不是隨隨便便使用一種標籤性的東西就能夠概括。過去 30 年是一個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意見和表現。當別人壓制和否定我們的時候，我們覺得不高興，反過來我們也不要輕易去壓制別人，否定別人。

有一個小故事，就是「六·四」以後，我原來是可以留在北京的，但是由於某些中央領導人的干預，一定要把我分配到貴州工作，這本來是我多年的願望，以前打過多次報告都未能如願。但「六·四」以後，當時我身體狀況不好，所處狀況也不適到貴州工作，何況我所在的那個單位，唯一要分到外地工作的人就是我。這種情況下，杜鷹就把這個情況跟鄧力群講，結果鄧力群就說孫方明我瞭解。他所謂的瞭解就是說他對我的傾向、觀點都很清楚。然後他就要我寫一封信，他來說話。我就寫了一封信把我的情況做了簡單的說明，提了留京工作的理由和意見。鄧力群把信轉到中組部，並且明確了他的意見是要把我留在北京工作。到最後，還是沒有辦到。後來有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很風趣的說：「看來有比我影響大的人做了決定」，解釋這事沒有辦成的緣故。為了這件事，還引起了「同仁們」的一些誤解，說是孫方明投靠鄧力群，真讓人啼笑皆

非。猛然間，讓人體會到人性悲劣的另一面。

還有一件事，大約在 1983 年或 1984 年的時候（也可能更早一點，也可能更晚一點，大體是這個時候），錢理群寫了《周作人傳》，當時要出版，很多出版社都覺得是一本好書，但是都不敢出，錢理群就把這件事跟我說了，我就給鄧力群講了這件事。鄧力群當時就說：讓他寫個報告，我批。當時他已經是中宣部長了。這本書後來出了，錢理群沒有寫這個報告。但如果錢理群寫了這個報告，他肯定也會批。他覺得這作為一個學術著作，應該出版。這是我所碰到的真實發生的事情。

鄧力群在 70 年代就認識我，1981 年 5 月 1 日，當時我跟羅小朋都是單身在北京的，家還沒有過來。過節的時候，鄧英淘就邀請我們去他家吃飯，那天去的客人裡還有賀敬之，大家一起吃飯聊天。1986 年我到中宣部給朱厚澤做秘書的時候，鄧力群也是知道的。但是他從來沒有找我去瞭解中宣部的情况，就是說他不願通過私人關係干預正常的工作。從很多觀點來講，他的意見和朱厚澤的意見是很對立的。我在給朱厚澤做秘書的時候，他當時是中央書記處分管宣傳工作的，他到中宣部來指導工作，見到我時，也就點點頭，從不要我做什麼，他遵循自己的原則。從這些事可以看出，人的豐富性並不是簡單的用一兩個詞彙就可以說得那麼準確的。

尊重自己的選擇，尊重任何其它人的選擇。尤其是，當人們普遍「缺鈣」時，要尊重少數骨頭硬的人，鄧力群，是少數骨頭硬的人中間的一個，他值得敬重。對此，有人問過我：你敬重鄧力群，同時又敬重朱厚澤，這不矛盾嗎？我回答：一點不矛盾，這是我自己的判斷，我不會去扭曲。

## 杜潤生與農村發展組

另外一位老人杜潤生，他對中國的農村改革農村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他是山西人，出生於 1913 年，今年應該是 98 歲